

論習近平鞏固軍權的策略與途徑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Strategies and Ways to Consolidate Military Power

海軍中校 曾孟傑

提 要：

- 一、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體制下，對軍隊乃至於政權，向以遵循「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的鐵律在運作；然綜觀鄧小平後的歷任領導者，實際情形卻與「黨領導一切」這個鐵則顯有落差。檢視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後的歷屆領導班子，前任領導人「不約而同」的透過緊握軍權，做為指涉政局的依憑。中共一直有「槍桿子出政權」的傳統，未能掌握「槍」、遑論掌握「黨」；因此，對「軍權」的集權程度，成為領導人權力掌控的象徵。
- 二、習近平接班後不僅快速「集權」，且牢牢地掌控軍隊，其如何能有別於前任領導人，並在就任後快速掌權，確實值得探討。因為習近平的舉措不僅維持共產黨體制下「黨軍關係」的相對穩定，也使其達成在政治上的「擴權」。
- 三、本文透過解構習近平掌控軍權的途徑，評估其權力穩固程度，尤其在兩岸敵對情勢不斷升高之際，中共「軍文關係」的穩定與否，攸關臺海局勢穩定；另一方面，深化對共軍體制的理解，也有助於國軍強化對共軍的認知程度，進而達到「勝兵先勝」的目標。

關鍵詞：軍文關係、反腐打貪、以黨領軍、黨指揮槍、軍事現代化

Abstract

1. Under the “one-party dictatorship” system of the CCP, the military and even political power have always operated according to the iron rule that “the Party leads the military and the Party leads the government”; however, looking at the leaders after Deng Xiaop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has fallen short of the iron rule that “the Party leads everything”.
2.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how Xi Jinping, unlike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was able to quickly take control of military power upon assuming offic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system, this not only maintained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system, but also enabled Xi Jinping to achieve political

“power expansion”.

3. By deconstructing the ways in which Xi Jinping controls military power, we can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his personal power is firmly entrenched. At a time when the cross-strait situation is ris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CCP's 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 is crucial to avoiding a shootout in the Taiwan Strait.

Keywor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ti-corruption, party-led military, party-led gun, military modernization

壹、前言

在中共政治體制下，對於軍隊乃至於政權，向以遵循「以黨領軍、以黨領政」的鐵律在運作。回顧鄧小平以降歷屆領導人的權力運作模式，都迴避不掉前任領導人挾著對軍權的掌控，對政局進行指涉，江澤民及胡錦濤亦是如此。中共向來擁有「槍桿子出政權」的屬性與傳統，若未能掌握「槍」，遑論掌控「黨」。因此，對軍權的掌控狀況，可檢視領導人權力穩固的程度，即使「個人權威型」領導人凋零，接班的「職務權力型」文人領導，由於不具備軍事背景，「黨指揮槍」的原則就會碰到軍隊高層菁英把持的困境，並讓這些高階軍官在「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上，實際控制著軍隊。¹

自2012年「十八大」後，習近平正式接班，當時共軍受郭伯雄、徐才厚兩大軍頭濫權影響，造成紀律檢查部門形同虛設，軍隊也屢屢傳出「賣官鬻爵」的醜聞，嚴重斲傷部隊士氣與戰力，更威脅到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習近平採取的手段係著眼於現實因素的考量，首先是軍隊系統的糜爛風氣與企盼整頓的大環境氛圍；其二，既有的指

揮系統已形成介於軍委和基層部隊間的獨立階層，實質阻礙了軍委主席的領導；其三，初接任的軍委主席權力，普遍受到前任或既有高層的限縮；最後，則是加速軍事現代化建設、推動軍隊專業化，俾有助於確保軍隊高層不介入「黨」的核心運作。換言之，其一系列的舉措均非出於偶然，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本文主要在探討習近平如何能在就任後快速掌控軍權，以及透過對軍權掌控，維持共產黨體制下「黨軍關係」（即民主社會所謂的「軍文關係」）的相對穩定，進一步理解其如何在政治上進行「擴權」。其次，對於習近平所樹立「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之強軍目標，亦透過「軍改」乃至於「軍隊專業化」等軍事視角，對「能打勝仗」這個內涵進行探討。藉由分析習近平掌控軍權的途徑，我們可以評估其權力穩固程度；尤其當前兩岸敵對情勢不斷升高之際，中共「軍文關係」的穩定，實質影響到臺海局勢能否避免「擦槍走火」引發衝突。咸信唯有透過對共軍體制的理解，才能有助於國軍強化對共軍認知的程度，期望在「知彼」的前提下，領導者及國軍均有智慧保有「戰

註1：Chien-wen Kou,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CP-PLA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32 (December 2017), pp.866-868。

略定力」，亦持恆戰訓本務，以達成「勝兵先勝」的目標，這也是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

貳、中共「軍文關係」的理論概述

針對中共「軍文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70年代，當時多數的西方學者均聚焦於蘇聯體制，並認為中共的「軍文關係」模式屬於特例，不適用於以往熟知的任何類型。²1980年代以後，對於共軍體制的研究，才逐漸有了系統性的理論與歸納。針對其「軍文關係」理論之研究，以年代來區分，概可劃分為以下兩時期：

一、1980年代前後，美國政治學者畢科福德(Thomas J. Bickford)將中共的「軍文關係」歸納為「派系」及「專業化」模型兩個基本層次，³概要說明如后：

(一)「派系模型」(即野戰軍途徑)

中共建政後，黨高層和軍事領袖，幾乎毫無例外的都出自四個野戰軍，⁴這種基於軍隊裡的共同經驗所結合而成的派系，使得往後中共不論「黨」和軍隊的重要人事，或是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執行，都可以發現是基於各野戰軍的決策考量。「派系模型」在解釋「文化大革命」(以下稱「文革」)前中共軍事領導人的政治行為時，確有其適用性；

⁵然為確保政權的穩定，阻絕派系網絡危及「黨」的決策核心，於是在1971年「文革」中後期開始對軍隊進行大範圍的移防與調動，使原有各野戰軍的建制被刻意改變，許多個人關係網絡亦遭到破壞，使得這種「分析層次」(Level of Analysis)⁶的適用性大為降低。

(二)專業化模型(即黨控制途徑)

此理論途徑根源於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其論點構建於對民主政體的「軍文關係」分析，認為軍隊應藉由保持中立並「去政治化」，以換取文人對其專業之信賴，進而擴大軍隊對軍事事務的自主性與權力。⁷這種解釋途徑對於「列寧主義式」(Leninism)政治體制下的「軍文關係」，存在解釋性不足的問題，例如在中共體制下，軍隊不可能達到全然政治中立，而政治上完全中立的軍隊，亦違反其效忠「黨」的原則等。故西方政治學者簡克斯(Harlan W. Jencks)將其解釋性做了些許的修正，例如不再將民主政治中「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這個標準，視同為共軍的專業化表徵。另共軍在政治上的「緘默」(Political Quiescence)，可視為專業軍官在受到思想教育和「黨」至高性的灌輸後，文人(黨)統制(指揮)軍隊的原則受到強化；致使中共軍隊逐漸遠離政治，而專注於軍事

註2：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02年)，頁89。

註3：同註2，頁91。

註4：同註2，頁91-92。

註5：同註2，頁92。

註6：分析層次係指理解問題的切入點，學者用以在一個範圍內觀察特定的政治現象，並試著提出可能的解答。陳牧民、陳宛郁，《圖解國際關係》(臺北市：五南出版社，2019年)，頁9。

註7：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M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80-84。

事務。⁸

二、1990年代以後，外界針對中共「軍文關係」的研究，亦可區分為「共生性」及「綜合性」兩個層次來進行理論分析，概述內容如后：

(一) 共生性途徑

長久以來，「軍文關係」中「提升軍事專業」與「保持政治性」（或稱「黨性」）這兩個概念是相互抵觸的；然美國著名中共問題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卻認為，共軍與黨國間有著「無可切割的共生性」，因此其軍事專業也必然帶著政治性。這種「黨」與「軍」長期的「革命共生」的關係，從「建政」前一直延續至今，使得「發展軍事專業」與「保持高度政治性」被視為共軍專業化的一部分。⁹由於該途徑有效調和專業軍人如何能效忠於「黨」，以及軍隊角色既實際推展軍事專業卻又從屬於「黨」，此途徑也為共軍專業和共生提供「與時俱進」的新概念。¹⁰

(二) 綜合途徑

1997年，美國政治學者約菲(Ellis Joffe)針對中共的「軍文關係」，重新劃分

6種綜合模式，包括「高層整合」（指黨、內外的爭鬥，能因高層軍、文領袖的緊密結合，而有效弭平）、「低層分離」（指低階層的軍隊單位，因與「黨」未竟相符的利益目標，從而出現職責及功能相互分離的趨勢，而有脫離政治的傾向）、¹¹「現代化與專業主義」（指共軍在現代化下仍服膺「黨」領導，亦具備執行專業任務能力）、「政治控制」（透過貫穿組織的軍隊政工體系，對軍隊實施監督及教育）、¹²「指揮與管制」（指共軍的指揮結構，自「軍委會」已降逐級節制，並未出現過違抗黨命）與「非干預軍」（指共軍高層從未主動、自發的直接介入政治）。¹³這6個模式最為人批評的，不外乎它們各自雖能解釋一個面向，但卻也都無法調適中共「軍文關係」裡所包括的複雜性，同時模式間彼此亦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因素，難有「放諸四海皆準」的一貫通則。¹⁴

三、隨著探討中共「軍文關係」的理論日漸多元，且以往的分析探討無法調和其內的複雜矛盾因子，為避免單一的取材分析，可能衍生片面或「以偏概全」的結論；因此，本文所述論點係基於我國學者洪陸訓教授

註8：「黨控制途徑」(party-in-control)或稱為「軍文關係」，最早由毛澤東在其著作《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所提出的「黨指揮槍」原則，即為此途徑所依循的教條根源。

註9：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127 (Fall 1991): pp.530-568。

註10：同註2，頁99。

註11：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P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David Shambaugh & Richard H. Yang, eds.,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35-39。其對中共的「軍文關係」分為「高層整合」(integration at the top)、「低層分離」(separation at the bottom)、「現代化與專業主義」(modern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對共軍的政治控制」(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PLA)、「對共軍的指揮與管制」(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PLA)、「非干預軍」(a non-interventionist army)等6種。

註12：同註11，頁39-42。

註13：同註11，頁43-44。

註14：同註11，頁102。

表一：中共領導人未實質貫徹「黨指揮槍」狀態一覽表

領 導 人	權威型領導人於背後 實質掌權	是否就任 軍委主席	軍事歷練與 軍隊威望	備 考
華國鋒 1976-1982	○	○	X	領導地位因鄧小平崛起，而漸被取代。
胡耀邦 1982-1987	○	X	X	因同情共產黨黨內「自由派」，被迫下台。
趙紫陽 1987-1989	○	X	X	對「六四」民運處置失當，而遭罷黜。
江澤民 1989-1997	○	○	X	任期13年(1989-2002)，1997年鄧小平過世後，接軍委主席至2004年。
胡錦濤 2002-2004	X	X	X	任期10年(2002-2012)，2004年始接任軍委主席，掌握軍權僅8年。

資料來源：參考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及中共黨史網後，由作者整理製表。

所提出的「軍文關係多面向(因素)途徑」為基礎，¹⁵藉其中有關「組織秩序穩定」、「主觀文人統制」、「組織結構」、「軍事學說的轉變」以及「軍隊專業化」等部分動、靜態面向納入綜合考量因素，¹⁶並做為檢證與分析習近平鞏固軍權策略之探討途徑，期獲致更周延及完整的分析觀點。

參、重塑中共「黨指揮槍」原則的背景

即使中共有著「黨指揮槍」的傳統，但細數毛澤東以後的歷任領導人，並非每一個都能夠緊抓住「槍」，中共歷史上仍多有領導人未能落實「黨指揮槍」的例子(如表一)，¹⁷以下簡要歸納毛澤東以降，歷屆領導人實際掌控軍權之狀況，分段說明如后：

一、毛澤東至鄧小平時期

1976年「文革」結束一直至1982年期間，華國鋒即使身為最高領導人，卻始終沒有真正的掌握住軍權；而該年第「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小平開始以軍委主席一職直接掌控著政權，而黨權的最高領導者卻分別為胡耀邦及趙紫陽。黨的總書記卻不是軍委主席，明顯地違背「黨指揮槍」這個鐵律，即使江澤民、胡錦濤依序接班，前任領導者卻不約而同的透過緊握軍權，做為指涉政局的依憑。由於渠等均不具備軍事權威基礎，故兩人在就任之初均未能掌握軍權，除了無實質軍事歷練與軍隊威望外，最大的共同原因在於當屆接班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稱「軍委會」)成員都是前任拔擢晉升，導致繼任的領導人始終迴避不掉前任「干政」

註15：「軍文關係多面向(因素)途徑」，係透過對歷史遺產、意識形態、組織結構、政治社會化、派系衝突、軍人參與、集團利益、軍隊專業化、領導菁英職能專門化程度、軍事學說的轉變、國內秩序穩定、外力影響及制度結構變化等13個面向或變項(Variables)，做為精確檢證中共特殊「軍文關係」的分析層面。洪陸訓，《軍事社會學：武裝力量與社會》(臺北市：麥田出版社，1999年5月)，頁345-353。

註16：本文分析層面係按洪陸訓教授的分類，其中組織結構係屬靜態層面因素；其他諸如組織秩序穩定、主觀文人統制、軍事學說的轉變及軍隊專業化等，均屬動態層面因素。

註17：陳文政，〈中共十八大對解放軍的意涵〉，《新社會政策雙月刊》(臺北市)，第25期，2012年，頁1-2。

的陰影。

二、江澤民時期

江澤民自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接班後，對於軍權的掌控始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即使接替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仍不時表達難以掌控軍權的無奈。¹⁸接班之初，因受到俗稱「楊家將」的楊尚昆及楊白冰兄弟軍中權勢的掣肘，使其一直無法「抓得住槍」；即使渠等勢力於1992年全遭免職，仍不免顯露出文官控制軍隊的困難。¹⁹故鄧小平在1992年第十四屆「軍委會」換屆時，特任命劉華清及張震擔任軍委副主席，其中劉華清甚至位居政治局常委，等同在黨內與軍隊中為江澤民安排強有力後盾，²⁰直到「楊家將」的勢力被完全剷除後，江澤民才逐漸確立對軍隊的掌控權。²¹

三、胡錦濤時期

胡錦濤在接班後兩年(2004年)始接任軍委主席。其在接班之初，江澤民辭去總書記及國家主席職務，卻續任主席長達兩年，當時共軍所有上將皆為江澤民擢升，²²包含「軍委會」11名成員中的6名。即使在第二任

任期時，也因為江澤民拔擢的郭伯雄、徐才厚兩位強勢副主席，使得胡錦濤對軍隊的領導始終受到制約。在2002年高層會見「十六大」軍隊代表的《新華社》報導內容中，第一副主席胡錦濤的名字不僅置於報導文末，出現的次數也不如另兩位副主席曹剛川及郭伯雄，顯見軍事權威基礎對「軍文關係」的影響。²³尤其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胡錦濤因為無法順利調動軍隊投入救災，只能緊急召集政治局常委，以黨中央集體決議的名義，派遣部隊進入災區，更凸顯「黨」無法指揮「槍」的困境。²⁴

即使較之江澤民、胡錦濤兩人的資歷，習近平與軍方擁有更深的淵源，但就軍隊的權威及勢力而論，其終究無法複製毛、鄧兩人在軍隊中的威望；此種威望源自創黨、建政等特殊的革命經歷，以及軍隊指揮的實務歷練。換言之，若僅依循前任的繼位模式，恐同樣面臨難以緊握「槍」的困境。故習近平自接班以來，便有意識的總攬軍隊大權，這除了源自於「黨指揮槍」這根深蒂固的原則外，更是為避免重蹈軍隊的人事及預算權

註18：宗海仁，《第四代》(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頁527。

註19：Chien-wen Kou, "Xi Jinping in Command: Solving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CCP-PLA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232 (December 2017), pp. 866–868。

註20：沈明室，〈中共軍文關係的回歸或倒退〉，2018臺灣戰略學會研討會(臺灣戰略學會主辦)，2018年11月20日，<https://taiwan-strategy.com/news/2018-11-20/26-%EF%BC%881%EF%BC%89%E4%B8%AD%E5%85%B1%E8%BB%8D%E6%96%87%E9%97%9C%E4%BF%82%E7%9A%84%E5%9B%9E%E6%AD%B8%E6%88%96%E5%80%92%E9%80%8-0--2018%E5%8F%B0%E7%81%A3%E6%88%B0%E7%95%A5%E5%AD%B8%E6%9C%83%E7%A0%94%E8%A8%E6%9C%83%E7%99%BC%E8%A1%A8>，檢索日期：2022年7月15日。

註21：辛紅將，《中共高層恩怨》(香港：明鏡出版社，2013年)，頁99；洪志安，《中共胡錦濤主政時期的文武關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年)，頁209。

註22：吳胤璣，〈習近平穩固軍權之研究—以共軍上將陸驥為例〉，《復興崗學報》(臺北市)，第110期，2017年，頁104；同註17，頁5。

註23：同註20。

註24：李亞明，〈共軍參與中國大陸救援天然災害任務之研究：以雅安地震為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學系第四屆軍事政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13年)，頁19。

遭副主席把持，而出現「大權旁落」的覆轍。

肆、習近平鞏固軍權的手段與策略

由於胡錦濤任內，兩位軍委副主席長期把持軍隊指揮權及人事權，致軍委主席的「軍權」長期處於被架空的狀態。所以習近平接班前已對「軍委主席軍權遭弱化」的現狀感觸深刻；²⁵因此，要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不讓「黨指揮槍」成為口號，就必須快速集權，確保軍隊能夠「聽黨指揮」。以下就習近平如何牢牢掌控軍隊的關鍵作為，臚列分析如后：

一、組織秩序穩定(反腐打貪)

(一)自習近平上任後，即針對全黨進行「反腐倡廉」的建設，除為整治軍隊系統長久來糜爛風氣，呼應人民企盼整頓的大環境外，也為根除軍隊「盤根錯節」的腐敗問題，整頓軍中派系及鞏固軍權。自「十八大」以來，中共先後透過反腐肅貪行動，查處「省軍級」以上黨員幹部約440人，「廳局級」近9,000人，「縣處級」超過6萬餘人；²⁶另內部整肅含括超過1萬3,000名軍官，²⁷其中涉貪的將領中，政治委員以及後勤軍官占

多數。另透過「軍改」提升軍隊審計和紀檢監察部門的位階，以重樹監督的權威性與實效性。²⁸

(二)過去「總政治部」(以下稱「總政」)掌握著軍隊人事權、「總後勤部」(以下稱「總後」)則掌控著軍產與財源；而兩單位卻分別負責軍隊紀檢及預算審計，使得軍隊原有制度上的防腐功能，反成為腐敗核心。「軍改」後，此等單位直接隸屬中央軍委，讓軍隊的監管機制能澈底獨立行使職權，亦確保反腐作為能夠延續，且即便在完成權力鞏固及「軍改」後，反腐力道仍未稍減。如前國防部長常萬全，即使早已屆齡退休，卻因牽涉郭、徐兩位軍委副主席的貪腐案，在2019年將其退休待遇連降兩級；²⁹另2019年10月，前西部戰區陸軍副司令員及前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兩人，也因涉及違紀被免職，³⁰都印證習近平反腐、打貪「決心如磐石、腳步不停歇」。

「反腐打貪」不僅重拾人民對「黨」的信任、根絕軍隊不良風氣，同時也是習近平「樹立威信」的手段，使其擁有更深、更廣的軍隊掌控力；另一方面，雷厲風行的肅清

註25：陳煥森，〈習近平鞏固軍權與共軍高階將領貪腐事件之研究〉，《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3卷，第12期，2015年，頁72-75。

註26：〈觀點：習近平宣稱「反腐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傳遞什麼信號〉，BBC中文網，2018年12月27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6691256>，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註27：〈世界級的解放軍！習近平的強軍夢能成真嗎？〉，天下雜誌網，2019年7月1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5839>，檢索日期：2022年8月5日。

註28：同註25，頁94-96。

註29：〈港媒指前國防部長常萬全因涉貪遭降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9年12月7日，<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0712-%E6%B8%AF%E5%AA%92%E6%8C%87%E5%89%8D%E5%9C%8B%E9%98%B2%E9%83%A8%E9%95%B7%E5%B8%B8%E8%90%AC%E5%85%A8%E5%9B%A0%E6%B6%89%E8%B2%AA%E9%81%AD%E9%99%8D%E7%B4%9A>，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註30：〈【解放軍大地震】兩將軍被撤人大代表資格 饒開勳連降兩級免坐監〉，蘋果新聞網，2019年10月26日，<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191026/Z5GCUXO5WYXOK5RCEX5SD5UP3I/>，檢索日期：2022年8月19日。

行動，有助於拔除反對或既有的派系勢力，確保領導人不受派系或前任領導者的干涉，加速掌握大權，建立可信賴的人事布局。

二、落實主觀文人統制

習近平為落實「主觀文人統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採取的策略是最大限度地擴張文人的權力，確保軍隊的服從，鞏固自身在共軍中的領導地位。³¹因此，藉由軍委主席的權力，透過拉攏軍方勢力、樹立自身派系等手段，重新針對軍隊核心進行結構配置，其中又以對高階將領的晉升與罷黜為最有效且直接的方式。其作為及特點如后：

(一) 擢升人數大幅增加

1. 共軍自1988年起獲授上將軍銜的高階將領共計201員，³²其中鄧小平8年任內僅17水員，江澤民的15年任期總計79員最多；³³但習近平卻以年平均擢升近7員最高，且年平均擢升數及授銜次數均超越前兩位領導人(如表二)。頻繁且大量的晉升，有助鞏固軍隊對領導人的忠誠度；另透過對高階將領的

陞黜，對軍權的核心重新進行可信賴的人事布局與配置，並樹立權威。

2.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前朝擢升的將領幾已清除殆盡，僅2人例外，其一為許其亮，因曾與習近平共同任職於福建省的經歷，成為其在軍委主席時在軍隊中最信任的親信；³⁴另張又俠則因其父親與習仲勳(習近平之父)在「國共內戰」時期有共事情誼，且同為「紅二代」³⁵的身分，因而受到信任。³⁶「十九大」後，因中共領導人任期已不再受限制，可以預見習近平在位的時間越長，權力地位將越穩固。

(二) 打破晉升慣例

1. 依據《中共現役軍官法》條文³⁷及過去授予上將軍銜的慣例與規則，晉任上將的條件包括擔任「正大軍區」職務滿2年、中將階任滿4年，及軍旅生涯滿40年等。³⁸由習近平接任後的晉升狀況來觀察，中將階提早派任上將級別職務，甚或提早2年占上將編缺共計15員(如表三)，³⁹其中有極高的比例都是階級資歷未滿4年狀態下的「未符合資

註31：「主觀文人統制」的本質是否認一個獨立軍事勢力的存在，認為削減軍人權力至最低程度的方式，即是極力擴大文人集團相對於軍人的權力。同註2，頁113-115；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id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al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80~85。

註32：〈解放軍上將列表〉，維基百科，2022年7月2日，<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4%B8%8A%E5%B0%86%E5%88%97%E8%A1%A8>，檢索日期：2022年8月16日。

註33：吳胤璪，〈習近平穩固軍權之研究—以共軍上將陞黜為例〉，《復興崗學報》(臺北市)，第110期，2017年，頁104；〈中央軍委舉行晉升上將軍銜儀式 習近平頒發命令狀並向晉銜的軍官表示祝賀〉，中共國防部，2021年9月6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21-09/06/content_4894191.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5日。

註34：同註33，頁106。

註35：紅二代，起源於「文革」中常用的「高幹子弟」，中共建政後，行政級別達到13級以上的被稱為高級幹部。

註36：王鈞，《太子黨風雲：王立軍事件引爆權爭驚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頁477。

註37：〈中共現役軍官法〉，中共國防部，2016年2月19日，http://www.mod.gov.cn/big5/regulatory/2016-02/19/content_4619315_5.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5日。

註38：穆堯，〈解放軍「蟄伏」40年-冬季人事換血加緊備戰〉，《多維月刊》(北京市)，第40期，2019年，頁72。

註39：〈習近平的新科上將們〉，上報，2019年8月1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8830，檢索日期：2022年8月10日。

表二：鄧小平以降歷任中央軍委主席晉升上將人數統計表

領導人	軍委主席任期	授銜次數	晉升上將人數	年平均擢升人數
鄧小平	1981/6-1989/11	1	17	2.12
江澤民	1989/11-2004/9	8	79	5.26
胡錦濤	2004/9-2012/11	9	45	5.62
習近平	2012/11-2022/12	13	60	6.66

資料來源：參考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中國軍網及環球網後，作者整理製表。

表三：習近平任內共軍「職務級別」未對應上將統計表

軍銜與級別不相符時間	職務姓名
2年	◎政委計劉雷(陸軍)、于忠福(空軍)、秦生祥(海軍)、王家勝(火箭軍)、吳社洲(西部戰區)、范驍駿(北部戰區)、何平(東部戰區)。 ◎司令員計沈金龍(海軍)、丁來杭(空軍)、周亞寧(火箭軍)、袁譽柏(南部戰區)、李橋銘(北部戰區)。 ◎部、校、院長計李尚福(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鄭和(國防大學)、楊學軍(軍事科學院)。
1年	王建武(南部戰區政委)

資料來源：參考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各大微信公眾號、中國軍網及環球網後，由作者整理製表。

表四：習近平任內共軍「階級資歷未滿」擢升上將統計表

軍種	資歷未滿時間	姓名
陸軍	中將階3年	鄭和、劉雷、吳社洲、朱生嶺
	中將階2年	韓衛國、何衛東、李橋銘、何平、王建武、張旭東、王秀斌、徐起零、汪海江
	中將階1年	張升民、林向陽
海軍	中將階3年	苗華、沈金龍、董軍
空軍	中將階3年	于忠福、常丁求
	中將階2年	郭普校、許學強
火箭軍	中將階3年	周亞寧、徐忠波
戰略支援部隊	中將階3年	李鳳彪、李尚福
	中將階2年	巨乾生
武警	中將階3年	王寧、安兆慶、王春寧

資料來源：參考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各大微信公眾號、中國軍網及環球網後，由作者整理製表。

格」晉升(如表四)。不僅三軍、火箭軍及戰略支援部隊等司令員出現「階級資歷未滿」獲拔擢，甚至中央軍委會委員張升民更是升任中將階僅1年，隨即晉任上將，⁴⁰凸顯習近平刻意打破過去的人事晉升慣例，藉此拉攏軍隊將領。

2. 除破格晉升外，習近平任內晉升還有

以下特點，首先打破過往原則與慣例，對背景清白的將領採連續晉任的方式，培養成為班底，如軍階與職務在2年內調整5次的第38集團軍軍長劉振立；⁴¹其次，晉用昔日「抑鬱不得志」或受打壓的「棄將」，使其因「知遇」而效忠，如仕途10年停滯不前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卻在習近平上任後，

註40：〈兩個月內升了9名上將 習近平用意何在〉，上報，2021年9月11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3709，檢索日期：2022年8月10日。

註41：〈共軍新星 軍改脫穎而出5名少將〉，中時新聞網，2016年1月21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121003170_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隨即獲得快速晉用。⁴²儘管對於將領的擢升不能全盤視為穩控軍權的象徵，但中共在揮別毛澤東、鄧小平這類「個人權威型」領導人後，繼任的「職務權力型」領導者(如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等)在黨內的權力繼承與鬥爭，已從過往透過「整風」運動對前朝勢力進行拔除清洗，逐漸轉化為藉由全權掌控人事大權，進行可信賴的人事布局，⁴³從而實踐對軍隊的實質掌控，並樹立足夠的威望。

三、組織結構改造

習近平在「十八大」後，除人事布局外，亦著手軍隊體制的變革，其中許多的改革措施不僅幅度大，更觸及軍隊既有勢力的利益，包括指揮體制的變革、破除「大陸軍主義」(將大軍區改為大戰區制)以及裁減軍隊員額等，每一樣都可能是撼動根基的大工程。基於「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習近平為避免步上胡錦濤時期「令不出中南海」的後塵，⁴⁴其在接班後對於軍隊體制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作為，概要分析如后：

(一)軍政、軍令分立的指揮體制

1. 由於共軍原「四大總部」(總參、總政、總後及總裝)權力過於集中，形成了一個介於軍委和基層部隊間的獨立指揮階層，阻礙軍委主席的集權領導，⁴⁵因此「軍改」



圖一：習近平主持五大戰區成立授旗大會

資料來源：〈習近平親授旗 七大軍區調整為五大戰區 有何深意？〉，鉅亨網，2016年2月2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232742>，檢索日期：2022年8月10日。

中，「脖子以上」的改革因而成形。為了貫徹「黨指揮槍」之目標，中共在2016年1月11日，將原軍委下轄的「四總部」，改制為7部、3委員會及6直屬機關的16個職能部門，原有約47個一、二級部門削減近7成，稀釋並分散過往「隻手遮天、獨當一面」的權力，不僅將「軍政」及「軍令」系統分立，並把實質的指揮權回歸「軍委會」及軍委主席手中。⁴⁶

2. 「軍改」前，中央軍委與軍隊間橫互著獨立領導層級(即四大總部)，指揮權實質被總參及總政把持，讓「軍委主席負責制」成為口號。透過「軍改」將「大軍區」過去同時擁有的「軍政」及「軍令」兩大權力脫鉤，成立「戰區」專司「軍令」的聯合作戰

註42：〈血戰越軍的陸首任陸軍司令李作成〉，中時新聞網，2016年1月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107005367-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註43：同註33，頁114。

註44：陳煥森，〈習近平軍隊指揮結構改革工作之研究：以鞏固軍權重振「黨指揮槍」紀律為分析觀點〉，《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4卷，第10期，2016年2月，頁50。

註45：同註44，頁50。

註46：謝游麟，〈中共軍隊體制編制改革之研究〉，《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4卷，第12期，2016年，頁42-56；陳津萍、張貽智，〈軍改後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組織與職能之研究〉，《軍事社會科學專刊》(桃園市)，第15期，2019年，頁29-32。

指揮(如圖一)；而建軍備戰的「軍政」職能，則改由軍種司令部來統籌，形成「軍委—戰區—軍種」指揮領導體系，貫徹「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方針。至此，「軍政」(軍種)及「軍令」(戰區)成為軍委轄下兩個彼此分立又相互制衡的系統，充分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

(二)打破大陸軍主義的指揮結構

中共建政後，承襲前蘇聯的軍制構想，基於幅員遼闊所面臨的地理環境、敵情威脅、民情文化及建軍需求等差異，形成「各軍區」獨立國土守備的人民戰爭概念，並採行「大軍區」這種以陸軍為核心主軸的制度。⁴⁷在歷經多次的整併後形成「七大軍區」的格局，除負擔大量行政管理職能外，也可說「既主戰、又主建」；⁴⁸從領導人的角度觀之，大軍區司令員權力集中，形同割據的軍閥，軍區成為7個「管不到、構不著」的獨立機構。因此，除將政、令分立外，「軍改」的另一目的，就是要打破長久以來被陸軍所把持的軍隊系統，主要用意如下：

1. 以往「大軍區」指揮職務的設計是以陸軍為主，各「大軍區」海、空軍司令員在編制上僅為該單位的副司令員，主要戰略方

針均針對陸地而非海洋，故海、空軍成為支援軍區地面部隊作戰的輔戰軍(兵)力。⁴⁹新成立的陸軍領導機構，成為與海、空軍平等對應的單位，並打破以陸軍為核心主軸之傳統，也使共軍的海、空及火箭軍等，提升至現代化戰爭主戰軍兵種高度。⁵⁰

2. 中共新時代「國防戰略」方針已經不再是防止敵人入侵國土，「軍事戰略」也改變成軍事行動不分前後方、跨越境內外；故作戰基本單位必須聯戰化。⁵¹「軍改」後，事務性的工作將由軍種管理，而戰備訓練這類作戰指管運作機制，則透過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來整合戰區內不同的軍、兵種戰力，並訂立不同的任務目標，同時也能在戰時「一體化」指揮轄內的聯戰單位，⁵²以肆應國家安全及實際防務需要。

在完成「脖子以上」的改革後，中央軍委將更能貫徹「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也確保落實「黨指向哪裡，槍就打到哪裡」之目標；⁵³而透過人事布局、組織改造以及縮短指揮鏈，軍委主席對軍隊已能絕對領導。在決策上，主席直接指揮戰區，並安插可信賴的親信班底，除穩固了領導人實質的軍權，亦確保共軍能肆應現代化戰爭，在效應上

註47：褚漢生，〈從中共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探討習近平的「四個全面」總方略〉，《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0卷，第4期，2016年8月1日，頁24-25。

註48：〈中國軍改新舉措：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BBC中文網，2016年2月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2/160201_china_army_reform，檢索日期：2022年7月25日。

註49：馬振坤編，《解放軍建構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評析》(臺北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6年)，頁1-6。

註50：同註46，頁58-60。

註51：同註49。

註52：〈軍改首務建聯合作戰體制 習總強調：重中之重〉，大公網，2015年11月28日，<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5-11/3245759.html>，檢索日期：2022年8月10日。

註53：〈黨指向哪裡 就打到哪裡〉，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年9月1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0913/c40531-29531855.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30日。

可謂「一舉多得」。

伍、構建共軍「能打勝仗」的強軍作為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遵循鄧小平在1980年代末所提出之「韜光養晦」的對外方針，外交上秉持「不出頭、不當頭」的原則，始終低調而務實，並以經濟發展為先，一方面審時度勢，度過多重挑戰；另一方面收斂鋒芒，為國家爭取戰略機遇。習近平接班後，中共正逐步由「戰略收縮」轉變為「戰略擴張」，並將「韜光養晦」漸次調整為「有所做為」。其在軍事上敢於顯露鋒芒，不僅先後提出「中國夢」這個遠程治國方針以及「強軍夢」的革新理念，更訂立「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強軍目標，俾在軍事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針提供有力後盾。其具體強軍作為分析如后：

一、軍事學說的轉變(即軍事思維的調整)

習近平就任後，共軍的軍事戰略雖仍以「積極防禦」為核心，惟在「十九大」後所提出的「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本世紀中葉建成世界一流軍隊」，已凸顯其有別於以往基於「韜光養晦」所訂定之「近海作戰」守勢思維，⁵⁴更體現中共面對外部的挑戰，正朝向更為自信、主動與積



圖二：共軍駐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

資料來源：〈兵家必爭之地！共軍駐東非吉布地基地啟用〉，風傳媒，2017年8月4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09728>，檢索日期：2022年8月10日。

極的模式轉變。而軍事戰略構想的調整，可視為軍事思維改變的前奏，也將進一步使中共在「軍事學說」上出現轉變，⁵⁵概述如后：

(一) 建立海外軍事基地

1.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飛躍成長，為發展海權、鞏固海外利益、提升中共在國際影響力等目標提供有力的基礎。習近平更表示「要著眼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⁵⁶基於保障航運安全、展現海權，以及有利兵力投射等思考下，2017年7月中共第一個軍事用途的海外「後勤保障基地」在吉布地(Djibouti)成立(如圖二)，這不僅是中共首次在領土疆域外尋求常態性的軍事駐留，也是發展海權的一個新里程碑。⁵⁷

2. 迄2022年5月，中共參與「亞丁灣護

註54：長期以來，中共一直遵循著鄧小平自1980年代末，基於蘇東劇變的國際大環境下所提出之「韜光養晦」的發展方針。基此，在軍事戰略上始終奉行「積極防禦、近海作戰」的務實思維。

註55：同註2，頁349-350。

註56：〈習近平：要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中國政府網，2013年7月31日，http://www.gov.cn/lhdh/2013-07/31/content_2459009.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註57：李亞明，〈中國大陸海軍權力擴張之研究—以吉布地軍事基地為例〉，《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53卷，第2期，2019年，頁64-65。

航」任務已派遣41批次護航艦隊、124艘次各型軍艦，總計超過2萬9,500人次以上的官兵參與；⁵⁸而常態性的護航任務以及維權執法，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成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也升級在區域的影響力。至於吉布地「後勤保障基地」的功能價值，除了打擊海盜外，亦可執行人道、維和任務及撤僑護僑等行動，更可配合「一帶一路」經濟戰略方針，在全球主要航線上發揮包括確保航運和能源運輸安全、監控水道暢通穩定等行動，更有助強化其大國形象。⁵⁹

(二) 劃設防空識別區及常態化跨島鏈巡航

1. 2012年9月，日本決定將釣魚臺收歸國有後，中共隨即於2013年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並對識別區內各種航空器的活動進行全面監管。依中共官媒報導，此舉除了軍事意義外，更有利於完善整體防禦體系，⁶⁰亦是針對日本所採取的一種隱含軍事意圖的回應。將釣魚臺周邊納入「防空識別區」，除使共軍於釣魚臺列嶼進行海空常態性巡駛，形成一個既成事實外，也是為與日本在法理上對抗進行的鋪陳，並為中共艦、機現身該海空域提供合理的依據。此外，透過此種擴張性的應對作為，可壓迫日方收斂

在釣島主權上的擴張與對抗行為，並回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共識上。⁶¹

2. 無論是劃設「防空識別區」或是常態化跨島鏈巡航，中共應對主權問題在軍事上顯然更為積極與主動。由這種在「戰術層級」採取守勢、「戰略層級」採攻勢的「積極防禦」方針，再檢視「軍改」後「成立戰區」等作為可以發現，共軍正澈底的「由內而外」完成體質改造，由誘敵深入的「人民戰爭」，轉向為「攻守並重」、優化軍事戰略布局的「後發制人」模式。⁶²

(三) 南海島嶼軍事化

面對國際的疑慮乃至美國的挑戰，中共在南海則採頻繁的戰、演訓、填礁造島，以及更具侵略性的維權巡航等手段作為回應，形塑擁有該海域實質主權，且能有效控制的既成事實。⁶³自2013年起，中共在南海12個實際控制的島礁進行「填海造陸」工程，除完成包括永暑礁等8個不同島礁的擴建，並在永興島上設立三沙市地方政府，以管轄西、中及南沙群島的島嶼與海域；⁶⁴另透過擴建深水港、大型軍機保障基地及部署長程導彈等作為，俾在共軍嚇阻手段失效時，發揮遲滯美軍、降低干預範圍等效果。預判未來

註58：〈中國海軍第41批護航編隊起航赴亞丁灣〉，新華網，2022年5月18日，http://www.mod.gov.cn/big5/shouye/2022-05/18/content_4911087.htm，檢索日期：2022年8月18日。

註59：陳德育，〈中共建立吉布地海外軍事基地之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3卷，第2期，2019年4月1日，頁128-129。

註60：楊志恆，〈中國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對亞太地區影響評估〉，《展望與探索》(新北市)，第12卷，第1期，2014年，頁11-13。

註61：胡聲平，〈東海防空識別區之爭與東亞權力格局的變化〉，《清流雙月刊》(新北市)，1月號，2014年，頁1-3。

註62：馬振坤，〈尋求恢復「歷史現狀」之中國軍事擴張與對臺威脅〉，《遠景基金會》(臺北市)，第20卷，第2期，2019年，頁21。

註63：蔡志銓，〈中共在南海造島之軍事企圖〉，《海軍軍官季刊》(高雄市)，第38卷，第1期，2019年2月，頁8-9。

註64：〈中國堅持在西沙群島填海造島〉，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2017年2月8日，<https://amti.csis.org/paracels-beijings-other-buildup/?lang=zh-hant>，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美軍在此區域的兵力活動，將面臨更高的任務風險。⁶⁵

中共正藉由推動軍隊專業化，使黨、軍間的區隔逐漸明顯，新一代的軍隊菁英將更專注於強化自身的軍事專業，並以「能打勝仗」為目標，也降低涉入政治鬥爭的機會。⁶⁶另外，透過對外形成的國防戰略優勢，也為共軍在保障海外航運安全、完善整體防禦體系，及對軍事資源的挹注等軍事專業的推動上，塑造了合理性與正當性。

二、軍隊專業化(加速軍事現代化建設)

依學者杭亭頓所主張的「客觀文人統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模式，最大限度地培養軍事專業主義，⁶⁷促使軍人「軍事化」(Militarizing)將有助於軍隊對文人的服從；而自主性的軍事專業化，體現於軍隊對戰爭技能的強化與精進。⁶⁸當文人也開始尊重軍隊對軍費、自身事務及資源的獨立自主權時，也同時代表著軍隊專業化的提升，從而將確保軍隊政治中立及減少介入政治的機率，並接受文人政府(或黨)的指揮。⁶⁹習近平就任後，中共的軍費便以平均超過百分之八的規模增長，⁷⁰不僅推進了軍隊現代化的發展，亦調和2015年裁減軍隊員額後的反彈聲浪。另為肆應日益複雜的國際衝突環境，中共智庫曾提出應對模型，認為若欲

表五：2012-2022年中共海軍成軍之主作戰艦艇數量統計表

艦種	驅逐艦	護衛艦	兩棲攻擊艦	航艦
2012		4		1
2013	1	11		
2014	2	10		
2015	4	9		
2016	1	10		
2017	2	10		
2018	3	7		
2019	3	7		1
2020	4	17		
2021	10	5	1	
2022	4		1	1

資料來源：參考穆堯，〈中國大陸海軍「擴張」幕後：東北亞軍事競賽啟動〉，《多維TW月刊》(臺北市)，2019年，1月號，頁65；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彙編，《米國議會への年次報告書—中華人民共和國に わる 軍事・安全保障上の展開2018》(東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018年)，頁28-31；〈中共海軍艦艇列表〉，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6%B5%B7%E5%86%9B%E8%88%B0%E8%89%87%E5%88%97%E8%A1%A8>，檢索日期：2022年8月18日，由作者整理製表。

嚇阻外部的箝制或掠奪，唯有加大對國防的投資，並置重點於海洋及航天科技。⁷¹當前隨著中共的綜合國力增長，共軍正朝向快速量產化、精準化、高科技化等方向發展，其具體的作為如后：

(一) 快速而大規模的艦隊編成

1. 依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分析統計，近10年間新成軍服役的

註65：同註63，頁23-24。

註66：洪志安、王官德，〈從軍事專業主義看胡錦濤時期的文武關係〉，《國防雜誌》(桃園市)，第47卷，第515期，2011年，頁76。

註67：同註7，pp. 80~83。

註68：客觀文人統制的本質是承認自主性的軍事專業主義，意在使軍人在政治上保持無為(sterile)和中立。同註2，頁113-115。

註69：同註2，頁166。

註70：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10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21年)，頁37。

註71：劉濤雄、胡鞍鋼，〈外部掠奪下的國防開支與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北京市)，第7卷第4期(2008年)，頁1351；閻學通，〈世界格局走向及中國的機遇〉，《當代亞太雙月刊》(北京市)，第5期(2008年)，頁7-13。

飛彈驅逐艦及護衛艦，數量較胡錦濤任內平均增長約6.5倍(如表五)，分別達到34艘及88艘之譜。⁷²當大陸官媒以「下餃子」來形容艦艇量產的速度時，⁷³依照美智庫的分析，中共已擁有300多艘各類型艦艇，超越美海軍287艘；按此速度推算，到了2034年其水面艦將超過430艘，潛艦將超過100艘，數量確實驚人。⁷⁴

2. 共軍近年來積極朝向「藍水」發展，以「一年開工一個艦隊、裝備一個艦隊、下水一個艦隊」的進程前進，除派遣護航艦隊前往亞丁灣，以提升遠洋作戰經驗外，更積極發展接近巡洋艦等級的「055型」大型飛彈驅逐艦，使整個航艦戰鬥群的配置更加完備；⁷⁵此外，自製的第二艘航艦「福建號」已於2022年6月下水，並配備電磁彈射系統，未來對美軍介入東海、南海甚或臺海問題上，將更具威嚇及震懾能力。

(二) 發展陸基中段反導系統

2022年6月19日，中共宣布在境內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的測試，並達到預期目的。所謂「中段反導系統」，係在敵方

導彈飛至最高、最快的「中段」時，於大氣層外將其摧毀攔截，既可以避免導彈進入國土範圍，安全係數也比在「末段」攔截更高，但技術上也最困難。⁷⁶陸基中段反導的技術所攔截的導彈，由於彈道高，也就必須在大氣層外進行攔截；因此，彈頭的技術必須小型化，同時飛行精度的要求高，還要有靈敏的目標尋獲導引系統，更要有強大的預警和監測網絡做後盾。⁷⁷此外，發展中段反導系統不僅存在技術難度，還需要雄厚的財力支撐，而中共是除美國外，全球唯二進行此試驗的國家；⁷⁸在此之前，中共軍方曾4次成功進行此種測試，說明共軍已經掌握了中段反導攔截的相關技術，⁷⁹其在反導系統的發展與突破，已令先進國家「望塵莫及」。

(三) 高超音速彈道飛彈的部署

中共為應對美國「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 Asia)以及「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正致力於在各領域打造符合「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戰略的「不對稱」武器系統。其在2019年「建政70週年」閱兵時

註72：穆堯，〈中國大陸海軍「擴張」幕後：東北亞軍事競賽啟動〉，《多維TW月刊》(臺北市)，1月號(2019年)，頁64-66。

註73：〈一年裝備1個艦隊下水1個艦隊！〉，環球網，2014年2月12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eLF>，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註74：同註72。

註75：蘇紫雲、曾怡碩主編，《2018國防科技趨勢評估報告》(臺北市：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2018年)，頁19-20。

註76：〈中段反導技術尖端 大陸四度宣布測試〉，TVBS新聞網，2018年2月7日，<https://news.tvbs.com.tw/life/866482>，檢索日期：2022年7月15日。

註77：〈中國宣布成功進行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18年2月6日，<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80206-%E4%B8%AD%E5%9C%8B%E5%AE%A3%E5%B8%83%E6%88%90%E5%8A%9F%E9%80%B2%E8%A1%8C%E9%99%B8%E5%9F%BA%E4%B8%AD%E6%AE%B5%E5%8F%8D%E5%B0%8E%E6%94%94%E6%88%AA%E6%8A%80%E8%A1%93%E8%A9%A6%E9%A9%97>，檢索日期：2022年8月15日。

註78：〈我陸基反導攔截試驗再成功 專家：技術難度極高〉，人民網，2018年2月7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8/0207/c1011-29810039.html>，檢索日期：2022年7月25日。

註79：〈陸媒：大陸「反導試驗」多次成功 攔截成功率提升〉，聯合新聞網，2022年6月20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6400786>，檢索日期：2022年8月20日。

，展示了「東風17」的高超音速彈道導彈。這款導彈能以超過5馬赫的巡航速度飛行，射程達2,500公里，在轉入滑翔階段後，其航跡根本無法預測，大大增加其嚇阻性。⁸⁰未來，此型導彈若搭載核彈頭，成功提升為「高超音速巡弋飛彈」，將使得西方現有的飛彈防禦系統難予攔截，同時升高中共對周邊區域的軍事威嚇能力。

從過往學者對「軍文關係」的研究，可以總結出一個趨向，即「國防預算的變化」也是軍隊政治權力和聲望的指標，並影響到軍隊的自我認知。文人政府透過軍事預算來拉攏軍隊，軍隊也藉由對文人政府表達忠誠，以獲取自身利益；⁸¹對軍隊而言，最重要的集團利益係來自於國家對軍事預算的支持。⁸²中共逐年增加的國防預算，代表著對軍隊的重視，藉以支撐軍事現代化與專業化；因此，龐大的軍事資源挹注，不僅能在中共內部形塑重視軍方的形象，亦可強化軍隊對於領導人的支持，進而呼應對外的戰略擴張，達成鞏固政權的目的。

伍、結語

習近平上台後，對鞏固軍權所做的種種努力，確實有別於前任，其所採取的手段與策略，著眼於四個面向，首先，是軍隊系統的糜爛風氣與企盼整頓的民心；其次，為繼任的軍委主席權力普遍受到前任（或派系勢

力)的限縮；第三，原指揮系統成為橫亙於軍委和部隊間的獨立指揮階層，影響軍委主席的集權領導；最後，透過構建共軍「能打勝仗」的強軍作為，推動軍隊專業化，及確保軍隊高層不介入「黨」的核心運作，這些都促成他就任後能迅速掌控「軍權」，並達成政治上的「擴權」目的。

在確保軍權鞏固的途徑上，若僅止於「掃除異己」、「拔擢親信」這類手段，仍舊無法解決「黨未能指揮槍」，更遑論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於是習近平在2015年，即著手進行軍隊結構及指揮系統的大規模改革，除廓清阻隔軍委主席直接領導的指揮鏈外，同時也為共軍肆應「能打勝仗」這個目標奠下基礎。習近平在掌握「軍文關係」中的菁英、制度以及發展方針後，同時代表前任領導人藉由緊握及插手軍權，做為指涉政局的「慣例」已被打破，軍隊更能「心無旁騖」的聽「黨」指揮，也確保任內「黨軍關係」的相對穩定。

面對軍權地位鞏固的中共領導人，也將對我國產生正、反兩面的影響。由於習近平的權力已「定於一尊」，這將有助壓制共軍內部鷹派的勢力，其對臺方略將完全服膺於個人的意志；因此，應不致重蹈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時，最高領導人為安撫共軍鷹派勢力，從而出現的強硬決策。⁸³換言之，除非是出於習近平個人的意志，否則短期內

註80：同註75，頁18；〈陸超燃衝壓技術猛進 東風17射程起碼增5倍〉，中時電子報，2020年6月4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604002573-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22年8月6日。


註81：同註2，頁236-237。

註82：Eric A. Nordlinger, "Soldiers in Politics: Military Coups and Governme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65-67。

註83：馬順隆，〈江澤民時期對臺政策的黨軍權力運作 以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為例〉，《國防雜誌》(桃園市)，第35卷，第4期，2020年，頁91-94。

兩岸間因擦槍走火而輕啟戰端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反面而論，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歷史定位追逐，將在外界預判的第三任期(2022-2027)中逐漸顯露出迫切性，⁸⁴國人切不可好整以暇的旁觀美、「中」戰略競爭，從而忽視臺海潛存的風險。

在兩岸局勢低迷動盪的此時，國軍除戮力戰訓本務外，也應謹守不輕啟戰端的「戰略定力」，並對中共日益多樣的「文攻武嚇」手段，保持高度的警覺。俄、烏衝突的前例「殷鑑不遠」，而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在2022年8月的旋風訪臺，卻也幾乎導致新的「臺海危機」發生，更凸

顯兩岸間情勢確實緊張。若我國一再進行挑釁，難保不會出現「臺海版本的俄烏戰爭」；⁸⁵因此，唯有減少政府對立激化，讓兩岸交流之「敵意最小化，利益極大化」，同時建構可恃戰力，方為確保臺海和平穩定的正道。 

作者簡介：

曾孟傑中校，海軍軍官學校89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及中國大陸研究碩士102年班。曾任海軍司令部督察官、編譯官、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科員，現服務於教育部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

註84：〈劃2049時間表？習近平智囊：統一就是實現中國夢〉，聯合新聞網，2021年11月16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893889>，檢索日期：2022年8月6日。

註85：〈俄烏戰事難休止：若發生在台海戰場，該如何應對？〉，聯合新聞網，2022年5月17日，<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0902/6316674>，檢索日期：2022年8月6日。

老軍艦的故事

鄱陽軍艦 DD-910



號為DD-910。

該艦成軍後除擔任海上防衛任務外，曾先後參加漢光、聯興、獵鯊等演習，民國73年6月30日，由於主機嚴重損壞，艦體也老舊不堪，而奉命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鄱陽軍艦由美國伯利恆鋼鐵公司製造，1944年6月2日完工成軍，編號731。民國61年7月6日美國將該艦售予我國，我海軍命名為「鄱陽」軍艦，編號DD-10，後改成DD-928隸屬驅逐艦隊，擔任海上巡弋及外島護航等任務，民國68年再改編